



我是从事报告文学门类写作的,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就题材而言,一直在跨界写作。于是,便长出了一双文学的双翼,一翼是铁马冰河、气吞寰宇的火箭军生活,一翼则是人间烟火深处的国计民生和重大工程。但中国故事的叙事坐标和落点,始终没有离开过普通导弹官兵和芸芸众生,可以说,他们是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度里的基层人物,是人民群众中重要的一员。

对于作家如何服务和歌颂人民,习主席在中国文联十大和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殷殷嘱托:“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的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今天,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多亿人民正在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的勃蓬发展,家庭的苦辣酸甜,百姓的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了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中国故事如何写、中国精神怎么表达,怎样展示中国气派和风格,习主席从哲学、文学的层面,赋予了时代的新意。这不仅仅是主旋律版图的一次文学拓展,更是一种高度的哲学自信、文学自信。它与世界优秀文学书写的坐标完全重合,且蕴含了人类文学古老真理,即爱情、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等人类的普世情感。写人民的欢乐与忧伤,写百姓的酸甜苦辣,可以说是一条文学的黄金律,古今中外作家概莫能外。观世界之变,究天际之理,悯浮生之情,对一位作家而言,终其一生,皆离不开爱情、命运、悲悯、尊严与荣誉,以及战争、灾难、牺牲、重生等的开掘与抒写。我们的目光所及,写什么,怎么写,习主席在作代会上已讲得非常清楚了。可以说为中国作家指出了一条人类文学书写的上线与底线。用这条黄金分割线来检视文学,寻找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学落点。一句话,就是要写好小人物的欢乐与忧伤。

写好小人物的欢乐与忧伤,首先对人民群众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上演中华民族历史上波澜壮阔的活剧,近40年的改革开放,堪称真正意义之上的五千年历史的大变局,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正向着“两个一百年”的历史时刻渐行渐近。然而,伟大的复兴之梦,是由普通百姓的人生梦想连缀、叠加而成的。小人物之梦,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青史断章;普通人圆梦的故事,沉淀为中国人圆梦底色。惟有小人物圆梦之旅一帆风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才会出彩。惟有基层官兵圆梦之旅精彩生动,中国梦才有持久的文学魅力。因此,我们要调整文学叙事的姿势,将作家的身段放低,再放低,对自己的写作的对象,尤其是小人物,捧一颗敬畏之心,拥一把悲悯之泪,甚至揣一种宗教之怀。将文学叙述的姿势降低,再降低,将文学的落点对准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心怀敬畏,不仅仅是作家对心中的上帝老百姓的敬畏,心生悲悯,不仅仅是对自己写作的角色,尤其是无名之辈、弱势群体悲天悯人。对小人物怀有一种温馨的敬意和敬畏,最重要的是要淡出英雄创造历史的惯性和怪圈,既

最近,杨匡汉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出版的专著《古典的回响》,让中国当代文学对接传统与追寻崇高的境界,让人文性资源与本土化策略得到有机聚合。他还用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艺术创新的“三新”,为当代文学家探索着一条通向文学经典的道路。

杨匡汉是从写诗评走向文学评论道路的,因而他首先是一位诗学家。他对郭小川、艾青诗作的研究和后来写的《缪斯的空间》《中国新诗学》,证明他在诗歌观念更新和诗学体系建构上,走在他人前面。杨匡汉更是一位当代文学研究家。他从诗评、诗学扩大到整个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成为一名新潮文艺的弄潮儿。然而杨匡汉的理论探求不满足于“新”,也不限于主编《共和国五十年》《九十年代文学观察》那样的著作。他从不开起门来建构体系。即使建构体系,他也十分注重对当下文学的诊断,这诊断有更深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他深知,如今的文学充满了喧嚣与躁动,城头不时变幻大王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承受着“西学东渐”的风气之重,因而作家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打破或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让自己的作品对接传统,具有历史文化的维度、生命体验的维度、



要至尊之人青史留名,更要为小人物长歌当哭。走出太过于自恋,宥于私人化、碎片化、自我化的个人经历,当然这不等于是否认个人独特体验在作家写作中的重要,但要改高人一等的说教为促膝相谈,将文学的视角,俯视改为平视,甚至仰视。手法能不能多几套路数,不要只站在高音部长啸,要有高旋律的风花雪月。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将他们举过自己的头顶,上升到至尊至伟的角度来叙述,守得住冷清,守得住寂寞。挖一口深深的战争之井、世相之井、人性之井、情感之井、文学之井,蘸着这些淘出来的清纯之水,或重彩粉彩抒写,或泼墨大写意,或工笔细绘、或白描勾勒,写出普通小人物在圆中华复兴梦、人生梦过程中的艰辛、温馨和感动。

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10周年,铁道总公司一位朋友告诉我,当年我写的方红文死了。我悚然一惊,问道,怎么死的?说患癌症而死。怎么可能?!方红文怎么会患癌症而死啊,她很年轻啊。对方说10年前她的身体透支,今天结账了。我听了阵沉默。方红文是我在青藏铁路采访过的一位女工,当时丈夫去了高原的楚玛河,让她在家带两岁的孩子,可是开工那天,有人告诉她的丈夫,方红文上来了。不会吧,因为当时大家都穿着红色羽绒服,丈夫在开工仪式里,终没发现妻子的身影,仪式结束相见时,方知是真的。在随后的日子,妻子一次次跟着丈夫上了楚玛河,几乎是到了就吐,折磨得欲死欲生,一次次因高原反应败退下来,车送至格尔木,好了再上,到了第四次,方红文终于在了楚玛河荒原待住了。即使如此,夫妻俩也分开居住,怕过夫妻生活猝死,只好周日放假时,在楚玛河背靠背地看藏羚羊轻灵掠过。一干就是4年,可是浪漫的时光终究不久,10年后,一个年轻妈妈的生命遽然而止。这就是老百姓的中国故事。敬意敬畏之后,不能被感动。

写小人物的欢乐与忧伤,须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种更高的哲学视野,更深的历史纵深和独到的美学发现来诠释。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改革和建设生机勃勃,物质极大丰沛,毋庸讳言,人们的创造与欲望也全面失控,利益格局迅速分化,诉求多元,大家都在圆梦的路上狂奔,道德围墙和边界也在不断坍塌和突破。这给作家的书写带来无限的机遇与挑战,需从一个更高的哲学层次和历史坐标上阐释、校正。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无一不是对所处的时代,进行思想元素和美学元素的独到照亮和发现。上乘之作,一定是精神品质高拔,站在民族、人类的文学的高峰之

上,有独怆然而涕下的时代、民族、个人和历史的命运感,直面死亡的残酷与冰冷。有抒写爱情的美丽与凄怆,直通读者的心灵。特别要正视那些处于底层的百姓为一个民族和大国崛起所做的奉献,正是这些小人物,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脊梁。因为弱小,有可能在社会上失去了话语权,可是他们却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座城市的危难关头,最大限度地展示了生存、生命的代价和崇高。苦辣酸甜里有民族的正气歌,欢乐忧伤中有国家的无韵离骚,因此,从那些普通圆梦人的身上,感受国家社会的希望之梦,与一个大时代、一个伟大民族复兴梦的一致性,她们是中华民族百年复兴之梦的一枝一叶、一花一树,而非只是一些无边无尽的牺牲与毁灭、怅然与失落的低吟浅唱。可是很长时间,这些小人物却被我们作家的精英写作遮蔽了,作家不深入现场,不深入这些底层平民中间,关在玻璃窗里冥想,只会不着边际地展示这些小人物的苦难和重复对苦难的书写,其实比苦难更深层的才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历史宿命容易被我们所忽略,比苦难更让人感动的底层的温馨,也容易在我们的写作中缺失。可以说穷尽一生,我们迷失于此,但突破也在于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触摸这个边缘和底层处境去发现独特的美。

20多年的专业写作,我在努力抵近这个世界,寻找自己独特的发现和体验,并为自己定下如下规矩:三不写,即自己走不到的地方不写,自己没有听说过的故事不写,自己没有看到的地方不写。并作为非虚构写作安身立命的节操和坚守。我在写作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那场雪域之战时,历时8年采访,走遍麦克马洪线东段主战场的克节朗河谷麻麻勒等地,访问300多参战老兵和将领,但是东段西藏最远一个点察隅和瓦弄之战的地方却无法抵达,尽管书写成12年,皇皇53万字,但一直放在书柜里,对下察隅的沙玛未到现场,心里一直打鼓。今年10月,终于抵达了下察隅,路上走了三天,落石不断,险情迭出。往返半个月,在那里待了三天,弄清了当时部队悄然挺进瓦弄之时,因雾气太浓而迷路。在沙玛烈士陵园,看到了那些青春之躯不能裹尸回故地的缕缕忠骨。

文章经国事,笔走苍生情。从这个意义上,报告文学的写作,就是一种行走文学,以脚为笔,以笔作剑,作家写作零公里,就是走出书斋,而最后抵达的终点,则是回归到人民群众中间去。

服务和歌颂人民,我以为要关注小人物圆梦时的环境通道、快乐忧伤。哀民生之艰难,歌百姓之欢乐。惟有普通民众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实现个人梦想,这个社会、时代才是正常的。惟有普通官兵的梦圆之时,我们的改革强军梦才是铿锵英勇的华章,回望我们这个民族的复兴之路、强军之旅,当年正是那些优秀的传统作风和制度,给许多寒门之子、农家子弟,打开了一扇扇走向成功的大门,开辟了一条条圆梦的大道。一个普通士兵成为导弹号手,一位大学生成为导弹司令。无疑给这个社会以希望,也为江山社稷输入了源源不断

的人才源流,使五千年古老文明不死,血脉相承,基因强健,源源流长。因此,文学必须关注小人物圆梦环境和通道的变化,关注他们的欢乐忧伤。如果普通人圆梦的道路越走越逼仄,甚至被堵死,那将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悲哀。同样,如果基层官兵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人生之梦得不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中国梦、强军梦就缺少魅力。因此作家、艺术家要勇于担当,为小人物的中国梦,为普通官兵的人生梦鼓与呼,加大在圆梦环境和通道上的关注度,倡导正能量。文学是人学,文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乃是普通人的心性深处、灵魂深处最柔软、最脆弱,也最善良的情感世界。写出伟大的复兴梦、强军梦,乃至个人之梦,写出普通小人物在圆中国梦、人生梦过程中的艰辛、温馨和感动。若不是这样,沉溺于作家碎片化,私人化、自我化与自恋的叙事之中,所有的气力终将付之东流。抑或我们戮力而写的失败,也是没有希望和同情的胜利,这样的写作的意义何在?我曾有幸受中国作协委派,在关乎国民生计重大工程的工地上,写过青藏铁路,西电东送,在民族灾难、劫难来临时,写过‘1998长江大水,2008年冰雪之灾和汶川大地震,也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蹒跚多年。回首这些采访和写作经历,虽时过境迁,但是至今令我感念乃至挥之不去的,仍旧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在圆青藏铁路这个世纪大梦,在圆西电东送这个国家之梦时,个人的梦想十分渺小,却又非常伟大,无非是为幼小的儿女赚一笔学费,为小两口新婚无居买一间小屋,为白发苍苍的老爸老妈赚一笔养老费、医疗费。采访时与他们一起流泪,写作时仍为他们悄然涕下,他们在圆了中华梦、强国梦时,个人的住房梦、教育梦和医疗之梦,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可是人生一些美好的东西,被作家记下来了,不能不让人感动。他们的个人故事构成了中国故事最感动天动地的华章,他们的私人叙事才是真正的民族千秋青史,他们的人生之梦组合成了煌煌的中国大梦。我给自己立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文学信条,就是写命运之枪,写人情之悯,写人心之善,甚至写人性之黯。中国故事的姿势,应该得益于文学姿势的改变,最大的改变便是文本为经,人物为纬,人性情感沉底。把服务与歌颂人民的视角支点聚集到小人物的人生、命运,人的处境和人类的前途之上,甚至是死亡,写出人情之美、人性之枪、命运之舛。因此重大题材也好,前沿批判题材也罢,最终进入文学叙事时,必然有一个落点,就是大写的人,人的命运沉浮,人的情感真善美,人性的黑白灰,生命与荣誉的崇高和壮烈之美。沿着这条路径,也许我们可以解决有高原无高峰的问题,写出无愧这个时代的精品佳作来。

中国文学史上,有数量也有质量、有“高原”也有“高峰”的时代不止一次出现过。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环境。比如我们伟大的唐诗传统,重要的历史条件,一是经历了东汉末年以来三百多年的大动荡,从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到隋统一中国。这三个多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也是各种文明互相碰撞、渗透、融合的三百年。比如鲜卑这个北方草原民族,都城居然定到了黄河流域的洛阳。还有我们都很熟悉的花木兰,也是鲜卑人。我们没人觉得她是异族,就像我们汉族女孩一样可亲可爱。这表明我们文明的厚度、质感都增加了。中华文明就像一场大party,所有民族都来参加。血缘与文化的融合,优化了中国人的种族,也优化了我们的文明,所以到了唐代,中国人的人种都发生了变化,连唐朝皇室都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唐人已经不同于汉人,这种文明的优化,反映了我们文明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保持着自我再造能力,这是唐诗传统产生的历史条件之一,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来源之一。

再者,是唐代文化的多样性。当然这种多样性也是与前面的原因相关连的。唐代文化的多样性,从唐代人物俑的表情、唐三彩的色彩,乃至唐代绘画中都可以看到。比如《虢国夫人游春图》,骑在马上的人,不再像秦代兵马俑那样,全是老大爷们儿,各个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而全部是时尚美女。到了宋代,女人就不能这样抛头露脸了,“三从四德”开始约束她们。宋代也是既有“高原”又有“高峰”,但奔放开放、活跃自由的时代气氛还是首推唐代。这个时候,整个中国就只等李白出场了。李白一出场,就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

从「高原」到「高峰」

祝勇



间”,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样的时空感,以前从没有过。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也是那个时代的高峰,但中国诗,到李白,才抵达了真正的高峰。是唐代的历史环境成就了他。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主旋律重要,多样化同样重要。因为只有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历史条件下,真正的时代强音才能脱颖而出。

今天的中国,与唐代十分相像。但是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时代,不是小时代。一百多年的战争已尘埃落定,尤其是在经历了五四和抗日战争,中国完成了文明的再造和民族精神的凝聚,缔造了现代民族国家,并迎来了一个空前和平发展时期;二是我们的开放度空前,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前所未有的,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报告中所说,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我们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我们完全有理由憧憬,真正的文化高峰为时不远。

努力写出扎实厚重的作品

成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代会上的讲话,对作家、艺术家提出了四点希望,其实是四点要求。现在我们在讲,要写有温情的作品,总书记把“要求”讲成“希望”,这就是感动人的温情。

作为一名基层文联的工作者和诗歌写作者,在鲁院学习期间学习和领会讲话精神,结合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精神,我最深刻的体会:

一是记住“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要求,把自己的根扎在大地深处,努力塑造好自己的精神世界,自觉地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写作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不当市场的奴隶,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总书记的这“三不”要求,我理解的“市场奴隶”,不是单纯的经济市场奴隶,还应该包含文艺精神市场奴隶。在当下物化的社会里,文艺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人们普遍认为文学艺术家被经济市场绑架了。我个人以为,还应该另外有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艺术家的美学辨识度出了问题,也有一些是美学道德出了问题。那么,基层文联和作协组织好传播“引导明理和教化”正能量的活动尤为重要。2014年开始,我召集延安诗会,是学习1941年艾青他们发起成立的延

安诗会“开展诗歌交流、介绍国外的诗歌理论、探讨诗歌的发展、举行诗歌朗诵”的传统。也是实践总书记“要加强引领,突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组织向心力”的要求。

二是以路遥为榜样,继承好延安文艺为人民创作的优良传统。“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这句话是雕刻在路遥墓碑上的,也是他生前的座右铭。总书记在“坚守艺术理想”这部分提到这句话,我的学习体会是总书记提出了路遥的创作精神。路遥在《平凡的世界》第一卷完成后患了肝癌,现在无法想象他是以怎样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把“死神的判决”作为秘密隐藏在他和弟弟王天乐两人心中,经过简单的中医调理后,在煤矿、在塞外完成了这部巨著。路遥用热水把痉挛的手指烫得恢复知觉后为这部作品画上了句号,完成了“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的文学理想,这就是一个大作家的理想。对于我,就是要探究一些具有“个性”的文学理想,摸索建立自己诗歌创作的完整体系,要求自己采用“原始文化意象”进行诗歌写作,努力写出扎实厚重的作品。

这两点体会,就是我的根,我的魂。

首都文学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座谈会发言摘登

染、所激励、所打动,并激发起他们创作经典性作品的潜力和活力。

有人认为杨匡汉是学者型评论家,其实这种说法一点也不新鲜。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带了不少博士生的教授,他当然是学者。但与一般学者型评论家的人确实有所不同,即杨匡汉用的是锲而不舍的真功夫。读他这部新著,足见他处处勤于独立思考,尤其是他将美学理论引进到文学评论中,使不少见解带有美学的深度,比如他谈新诗学的基础时提出,认为作为文艺学的一门分支,其理论基础离不开哲学,离不开统一与多样大存在的“文学地理”,更离不开“汉字思维”,即它的学科框架不应建立在单纯的艺术技巧上。谈到思想资源,他认为作家的哲学思考应拒绝工具理性,拒绝文而不化,拒绝使命感的失落,需要呼唤人文理性,呼唤重读传统,呼唤民族的自主性和诗歌的本体论。这种“三拒绝”与“三呼唤”,和他论述的美学资源是接轨的。他还进一步引出人文精神的追求,认为文明进步必须有仁、义、礼、智作支撑,视之为创作走出污浊、告别浅薄,获得文字雅洁的必经之路。杨匡汉这种思考与追求,让读者学到了

“延续与回翔”的辩证法。在第二章中,从“追忆历史”到“追寻崇高”,可以看到他阐释“文变染乎世情”的思想路径,条理清晰的论述,打开了作家心灵中的一扇窗户,令人产生出一种豁然开朗之感。

当前的评论家,除媒体派外,还有所谓作协派和学院派。杨匡汉无疑属于学院派,他的论著也有很浓的书卷气。但他文字不呆板,相反,行文充满了灵性与诗性,有时还擅用意象思维,用一系列的排比句,给人诗的享受。有些地方又穿插了一些市井故事,增加了理论著作的可读性。至于有些标题,如“鸣凤藻耀”、“饮之太和”,读者可能会感到难懂,但如果看了他的论述,就不难理解了。至于别出心裁地用对话形式写的《莫言的聊斋》一节,让莫言和蒲松龄进行超时空的会谈,探悉“现代”与“古典”的联系,读来别有一番兴味。总之,杨匡汉这本专著书名虽有“古典”二字,但作者的着重点是在当今的“回响”,每章每节都可看到这位学者用人文精神考察当代文学创作的踪迹,让读者内心深处产生作者是“永远的心灵朋友”的喜爱之情。

守护文明的学术品格

——读《古典的回响》

古远清

艺术上达的维度。在现代性的视阈与文学语境中,杨匡汉认为要反对文化的霸权主义,同时要反对文化关闭主义,要抵制文化的极端民族主义。因为这三种“主义”都有强烈的排他性,与海纳百川的胸襟不相容。作者历来鼓励而不同,并期待时空共享。在《古典的回响·弁言》中,出于对文学的忠诚、对真理的追求,杨匡汉对当前抛弃传统的创作弊端,勇敢地亮出自己的锋芒。有人说,当下的文学批评缺钙,杨匡汉的评论却是有血有骨,有自己的鲜明主体性。他对不良创作倾向进行分析 and 批评,从而把自己与某些人拜倒在赵公元帅脚下,把批评作为利益交换,作为商品交换的做法区别开来。

多年前杨匡汉就对文学经典问题发表过意见,认为当下创作的确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在繁荣后面存在着危机,危机就是精品寥

若晨星,鲜有经典性的文本。什么样的作品才称得上经典,对于可以上文学史的经典作家应具备那些条件?杨匡汉认为:

原创的,即对文化/文学发展有建树意义,有较高的认知价值的;“归赵”的,即曾经被遗忘、被埋没的文学精灵,经过打撈而“完璧归赵”;积淀的,即长时期能受到普遍关注的,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阐释的;“张力”的,即作为华人身份认同的一种文化符号与标识,能以有深度的陌生化形态,体现中华文化经验与人类普适价值相结绶且显示张力的;艺术的,即鲁迅说的“技巧的上达”……

如符合上面的条件,那么,在远远近近的人文文学传统中,便可以选出“经典”。杨匡汉这一看法,对当下从事创作的小说家或诗人来说,都可从中得到精神启示和力量,会被上述论述所感